

孙培青

孙培青
编

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

，提高人文素养，增进教育智慧，能以
观察教育现象，以适应时代进步的态度
。因此以教育为专业的人，都应关注教
一些教育史的知识，对于今后的工作
有长远的益处。

现在我要与大家讨论的问题是：“中国
展趋势”。我想集中为几个问题来谈。（讲

一 研究领域的扩展

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，但
国和成果都有局限。中国的改革开放，以

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，教育史学科
学恢复招生，课程教材，是开展教学

条件，教学需要，推动，各校按自己
件，或编写通史，或编写断代史，或编

后出版。解决了教学第三卷，就考虑
研究者感到这一类研究成果有局限，认为

内容要丰富，水平要提高。所以上世纪
纪初20多年间，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领域，

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，56个民族在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SHANGHAI EDUCATIONAL
PUBLISHING HOUSE

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

孙培青
编



孙培青
文集



第三卷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SHANGHAI EDUCATIONAL
PUBLISHING HOUSE



隋、唐、五代(581—960),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。许多教育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、科学家对与教育有关的问题有所论述,但文献材料颇为分散,查找实在不易。《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》选取这个时期三百八十年间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论著,原则上按人物所处年代的先后加以编列,从多方面反映这个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际的发展与变化。

隋是六世纪下半叶由杨坚建立的,它是统一南北、结束分裂局面的中央集权国家。隋王朝的统治较为短暂,只持续了三十多年,在一些教育家、思想家的推动下,虽制定了兴学的教育政策,但并未认真贯彻。教育事业曾有初步发展,但由于最高统治者思想的摇摆、政局的动荡,中途遭受挫折,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。从历史发展的过程考察,隋代创设的一些制度为唐代教育发展开辟了道路。隋代制定兴学的教育方针,设置学校,网罗人才,整顿文风,推行礼乐教化,重视图书建设等等,都是有重要意义的。

唐继隋而起,承隋的历史经验教训,实行隋已开创的一些有效的制度,走上繁荣强盛的道路,统治时间长达二百九十年。唐初,李渊就强调要兴化崇儒。李世民在“偃武修文”的思想指导下,于贞观初实行崇儒兴学的方针政策,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,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教育制度,使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

展。到了李隆基当政的开元年代,不仅官学受到政府重视,而且私学的开办也受到政府鼓励,还通过教育立法,在学校内部建立起较完备的教学制度。广泛发展的教育事业和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,是教育思想发展、教育论著产生的现实基础,所以唐代教育论著不仅绚丽多彩,而且数量有较大的增长,自然成为本书的主体部分。

五代延续五十多年,在分裂割据的特定政治条件下,各地方政权维持短期的安定,使地区经济和教育事业有所发展。战争的破坏,造成学校的不足;而民间书院的兴起,弥补了学校的不足。这是五代教育的特点。印板术的使用,使经书广泛传播,也为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。但是,这一时期在教育理论方面创新不多。

以下着重就唐代教育论著中的有关问题作一些说明。

关于崇儒的教育方针政策。这是这一历史阶段教育论著中体现的重要特点。唐王朝建立后,为了长远统治利益,在政治上、经济上暂时对人民作了一些让步,而在思想上则设法加强控制。儒学、佛教、道教成为唐代统治者控制人民思想的三件“法宝”。其中,与政治伦理道德密切结合,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发挥作用的是儒学。传统的儒学因为主张贵贱等级制度、忠孝仁义的封建伦理道德,采用通过礼乐教化移风易俗的感化手段,仍然适合帝王统治需要,成为官方学术。唐初就宣扬崇儒的理论,武德二年(619年)曾强调兴化崇儒,并颁发了诏书,在贞观年代继续提倡。其实际措施是用行政命令为儒家创始人孔丘立庙,规定定期祭孔的制度,并将儒家经典列为学校正式课程,通过学校教学渠道,把儒家思想灌输给年轻生徒,鼓励勤读经书的儒生,为他们提供参政当官的机会。论著中有不少议论崇儒、尊孔、读经、任贤的

文献,就是这种思潮的反映。

关于提倡道教,大量设置玄学。这是唐代教育政策中的新特色。李渊开其端,认道教始祖李耳为先祖,立庙奉祀,提高道教的地位。李治进一步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。李隆基推动尊崇道教达到高潮,命令京都及各州皆立玄元皇帝庙,士庶每家藏《老子》一本,勤加习读,贡举加试《老子》,还命令将崇玄学与玄元皇帝庙并设,规定博士与学生皆有定额,学习道教的“五经”(《老子》称《道德真经》,《庄子》称《南华真经》,《文子》称《通玄真经》,《列子》称《冲虚真经》,《庚桑子》称《洞虚真经》),其考试如国学,科举增设道举,为玄学生入仕参政开辟了道路。唐代依照行政命令设立的崇玄学达数百所之多,其教学有完备的制度。这种奇特现象是南朝的玄学所无法比拟的,后代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关于人性论的讨论。人性论是教育理论的基础,在唐代是被重视和讨论的问题之一。一些思想家为了论证统治者特权地位,选择合乎他们利益的人性理论,批评性善论、性恶论、性善恶混论等都属于一偏之见,而继承孔丘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”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”的观点,发展成性三品说。韩愈是这种学说的主要代表。与过去的思想家不同,他把性与情联系起来,以情的表现来说明性,认定情的品级和性的品级是相应的,肯定教育在发展和完善人性方面的重要作用。李翱与韩愈的观点有差别,他受佛学的影响,主张性善情恶,认为性本质上总是善的,而情都是恶的,情影响了性,使性受蒙蔽或破坏,因此教育的任务就是灭情复性。皇甫湜认同韩愈的性三品说,但偏向性善论,强调自觉勉励。后来的杜牧则抨击性善论、性善恶混论,而偏向性恶论,强调要用礼法来制约人的性恶。皇甫湜和杜牧在人性论上都缺乏新见解。

关于培养人才的标准。对选用官吏,李世民强调以德行学识为本,德行居于首位,学识居于其次。这也就成为培养人才的标准,此种人才要知道儒家以德治国的理论,遵循“三纲五常”的规范,能通达社会事务,经世致用,最好还要文武兼备。

关于伦理道德教育。统治者提倡忠君孝亲,规定《孝经》是学校必读的教材。李隆基还亲注《孝经》,颁于学校,作为标准教材。思想家肯定“五常”是社会道德规范,其中最基本的规范是仁与义(合称“仁义”),其他一切规范皆是仁义在各方面的实际表现。所谓自古以来永存不变的道,就是仁义。仁义存于内心,而表现于行为。在对待人我关系上,体现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的精神,责己重以周,责人轻以约。个人的修养与师友的影响密切相关,要审慎地选择善友,建立牢固的联系,如此在进德修业上会获益匪浅。要有道德是非观念,不能只计个人的利害而不顾是非,应该从道,而不是从众。处世之中,要坚持道德原则,实行时要从具体情况出发,适当注意灵活性。这就是内可以守其道,外可以行其道。

关于统一教学内容,统一教材。唐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确立,要求居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也相应地统一。当时南北有不同的门派,传播不同的注疏,体现不同的经学理论,学校教学难有统一标准,考试取士也无共同标准,这对统一思想是有妨碍的。李世民为了统一儒学思想,先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,统一了经书文字,后又令孔颖达负责组织一批经学家,研究汉以下的注疏,进行统一解释,成书后,又经过两次修订,最终编成一百七十卷的《五经正义》。这部官书颁发之后,成为国家规定的统一教材,也是科举考试的依据。统治者认为经学教材统一十分重要,

经文因年久而产生误差,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统一诸经文字工作。大历年间,张参奉命校勘五经文字。开成年间,李昂采纳郑覃建议,创立石经,都是这种思想的实际体现。经学统一,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,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满,他们突破官定注疏的束缚,凭己意说经,发表异议,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。这种舍注疏甚至舍传记而求经的做法,造成学风的转变。啖助及其弟子赵匡、陆质就是开新风气的先锋,支持者大有人在。

关于文化、科学繁荣与教育的发展。唐代国家统一,有较长时间的社会安定,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,促进了经济的繁荣;国际交流的开展,历史文化遗产的积累,为文化、科学的发达创设了条件。在文化方面,唐代文学的主要文体近体诗和散文极为兴盛,取得了辉煌成就,士人没有不会诗文的。官学和私学都教授文学,对学习文学和文学写作的方法,有不少人加以研究,此类论著颇多。唐代重视历史研究,强调史书编纂,组织编纂了多部史书,还有个人编写的重要史学著作,史学理论有了新的总结,史学传受也较普遍。在艺术方面,书法颇受重视,学习继承“二王”书体,创造唐代新书体,先后出现了许多书家,总结书法教学的许多经验,写下不少论著,成为宝贵的遗产。在科学方面,唐代重视数学,王孝通著《缉古算经》,李淳风注释《十部算经》,是数学的重要发展,也为数学教学提供了条件。地理学研究也有较大的发展,适应内外交通发展的需要,编成多种地志、地图,地理学家贾耽所绘制的《海内华夷图》等在绘制方法上有创新,都推进了地理教学。医学科学也有较大发展,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《外台秘要》是集当时医学大成的两部名著,《唐新本草》是一部收集大量药物资料并有药图配套的国家药典。这些著作作为医学教学提供了条件,有利

于医学教学的发展。学科的发展,不胜枚举。由上可见,社会需要促进学科发展,学科发展为社会服务。传授专门学科知识的专科学校的设立以及专家的私人传授,培养了各类人才,这是唐代教育的新问题,也是它的新特点。

关于教学思想。这方面的不少论著都是在教学实践基础上所作的经验总结,稍偏重于学习的经验。韩愈的《进学解》,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作,强调勤学要专心致志,博学要遍涉百家,精思要明其道义,育人要因材施教。教学思想的发展,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各学科教学法的普遍研究与总结,其中书法教学、文学教学经验的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。尤其是书法教学,从虞世南、欧阳询至颜真卿、韩方明,都有专篇论述,对后世有重要影响。

关于考试的要求和方式。唐代学校与科举考试制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,学校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才,科举的基本任务是选拔人才,科举为重,学校其次,两者的政治任务是统一的。学校考试的方式绝大部分仿照科举。对于选拔人才的考试,各方不断发生争论,主要有几个问题:要以德行还是才艺为选才标准?当时有人主张先德行而后才艺,也有人主张舍德行而取才艺。要保护特权还是否定特权?有人主张对贵族子弟给予特殊优待,考试可采低标准,任官则优先;有人认为对贵族子弟照顾太优会败坏政治,对国家不利,故对照顾应当有所限制。至于选用人才的途径,有人主张恢复古代的地方选举,废止科举;有人认为应当继续实行科举,进行全国性的考试竞争,学校毕业生中欲参政当官者都要参加。考试要求是重经学还是重文学?实际上,进士科颇受重视,越来越偏重文学。是重韵文还是重散文?有人主张以诗赋试士,有人主张废诗赋而用论议。考试方式是用口试还是用笔试?

有人主张口试简便，当场就可了解程度；有人主张笔试可复查，便于防止舞弊。以上情况表明，考试制度是当时存在争议的教育问题。

关于师道问题。儒家提倡仁义之道，而仁义之道有待于师传，故重仁义之道必然强调尊师，两汉经师以此受尊。自魏晋以来，在玄学和佛教、道教的冲击下，儒学地位下降，人们不热衷从师求道，尊师的观念日渐淡化。在科举制度实行后，进士科占据优势，诗赋策论成为入仕的重要手段，学习文学成为时代潮流。文学强调的不是师传继承，而是个人创新，士大夫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华，反以从师求教为耻。虽然有识之士不断地指出求师问道的必要性，但难于扭转社会上已形成的习惯。到了唐中叶，韩愈等人为了复兴儒学，发起古文运动和师道运动。韩愈的《师说》是师道运动的“宣言”，柳宗元的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是师道运动的代表作。他们在求师问道、革除弊风等基本问题上观点一致，相互支持。由于个人处境不同，他们在具体做法上略有差异：韩愈不畏流俗，旗帜鲜明；柳宗元担心受政治迫害，表现谦退。他们的主张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关于皇子的教育问题。唐代统治者为使政权传之万世，重视对太子及其他皇子的教育。他们认为皇位继承人的教育关系到国家存亡的根本，远则吸取夏桀、商纣败亡的教训，近则吸取隋炀帝亡国的教训，提出继承人不应过于娇生惯养，应当知道社会生活实际，要有品德修养，能适当处理与臣民的关系，要学习经史，懂得圣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，所以要注重师傅之教，为之创设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。李世民重视皇子的教育，确立师傅制度，任命心腹大臣为师傅，派忠实的人为随从人员。晚年，他又亲自写

了《帝范》作为遗嘱，教训李治。本着李世民的这种精神，后来吴兢编撰《贞观政要》时，列了《尊敬师傅》《教戒太子诸王》《规谏太子》等专篇。《贞观政要》一书成为以后皇帝的祖训，大臣们根据祖训提醒皇帝注意。元稹《论教本书》试作理论总结，涉及一些教育理论问题，值得加以重视。五代时张昭《请妙选东宫师傅疏》也属此类。

关于士大夫的家庭教育。士大夫是有文化知识的阶层，在他们之中产生统治人才。士大夫为了保持优越的社会地位，普遍重视家庭教育，或教以学优则仕，或训以为人处世，或传以专门学术，或授以为文之道。部分士大夫还以诗文阐发关于家教的思想观点，留传子孙。由于教导的对象是自己的子弟，因此士大夫的诗文都情真意切地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和厚望，如韩愈的《符读书城南》、杜牧的《冬日寄小侄阿宜诗》。李商隐的《义山杂纂》、柳玘的《家训》及《诫子孙》，都是士大夫家教的具体表现。

关于女子教育。唐代在封建三纲伦理原则支配下，男尊女卑，女子地位低下，男女的分工是男治外、女治内。对女子的要求就是成为贤妻良母，女子没有受学校教育的权利，只能在家学女工，习家务；条件非常好的，也只能在家读书识字，通常是读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女诫》等书，认识妇女的本分以及应守的伦理规范。个别杰出者将其思想表达为文字，劝告其他女性也遵守封建伦理的要求。如郑氏、宋若昭姐妹，她们都深受东汉班昭《女诫》提倡“三从四德”的影响，根据对妇女品德的要求，仿《孝经》而作《女孝经》，仿《论语》而作《女论语》，两书颇受重视，成为此后妇女教育的重要教材，影响颇为深远。

关于社会教育。隋唐统治者要人民安分守己，纳租服役，成

为驯民,不破坏社会等级秩序,因此对社会教育也给予一定重视,让地方官吏负起教导民众的责任,推行礼教,灌输忠孝仁义的思想,以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。杨坚既劝学又行礼,李世民令州县行乡饮酒礼,李旦申劝礼俗,都是统治者重视社会礼教的实际表现。有些地方行政官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推行礼教,使地方的风俗淳厚,秩序正常,农业获得发展,人民丰衣足食,取得较好的政绩。

在这本论著选里,还有关于其他教育问题的文献材料,这里就不一一提及。

本书在编选的体例上,不加注释,也不附译文。

本书在编选过程中,得到金林祥、张建仁、施国恩、徐书业、贾笕恒、孙璟、穆岚等同志的协助,谨此致谢。

由于隋、唐、五代人物众多,材料浩繁,选材定有疏漏,未尽妥善,敬希读者指正。

孙培青

二〇二〇年三月



一、我国古代教育论著往往跟其他论著混在一起,需要加以抉择取舍。因此,选材时,全文涉及教育的就选了全文;如果只有一段讲教育,尽量选自然段,一般不作语录式的摘选。

二、教育论著跟其他论著有联系的,如伦理教育与伦理学、审美教育与美学、音乐教育与音乐理论等方面,涉及教育的就选,不涉及教育的不选。

三、有些著作,经后人考证,其作者确有疑问,但这些著作也反映了当时或稍后的教育情况和思想,故还是选入,只列出书名,不写作者,在书的简介里说明。次序按论著内容或成书的时代排列。

四、论著按朝代划分,但若论著作者为后代人,则其所著前代正史中论述教育的文字收入前代的论著选。如果不是在正史而是在一般著作中论述前代教育,则此类著作仍编入作者所生活的朝代的论著选。

五、论著一般以作者生年为序,若生年未详,参照卒年;若生卒年皆未详,参照其活动的时间。如果作者的生年在某帝王的生年之前,他的教育论著写于此帝王在位时期,则对排列顺序予以适当调整。

六、原文有篇目的,用原篇目;没有篇目的,根据原书叙述或

内容拟篇目。

七、原则上按原书的字排印,改正避讳字(包括缺笔字)。有些地方有脱误或衍文,仿照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点校本《史记》的点校体例,参考有关文献,认为应删的删去,但保留原字,加个圆括号;认为应加上的加上,加个六角括号,以便识别。

八、标点符号遵照一般用法。引文加双引号,引文中还有引文的加单引号。

九、为了使读者了解作者的生平,在每位作者的论著前写作者简介。有的论著,如《隋书》,写书的简介,并介绍书的编撰者。

十、论著一般不加注释。根据新近整理的标点本(如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元稹集》《中说校注》等)排印的,不加校注。根据较早的其他版本排印,文字出入较大的,酌加校注。

十一、文献出处在论著之后注明,具体内容包括书名、卷数、篇名、出版单位和出版时间,例如:《史记》卷八七《李斯传》,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版。如果是辑佚的论著(如严可均辑佚的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),除了照原书注明原来的出处外,还写明录自何书。

十二、如果只选用论著的一段或几段,写明“节选”。如果一本书的各篇都是选用的,在书名后写“节选”;如果有些篇全用,有些篇选用,在篇名后写“节选”。



编者的话 / 1

凡 例 / 1

第一编 隋 代

柳 昂 / 3

上文帝劝学行礼表 / 3

杨坚（隋文帝） / 5

劝学行礼诏 / 6

劝学诏 / 6

施用雅乐诏 / 7

简励学徒诏 / 8

令州县搜扬贤哲诏 / 8

牛 弘 / 10

上表请开献书之路 / 10

何 妥 / 13

定乐舞表 / 13

李 谔 / 16

上书正文体 / 16

杨广（隋炀帝） / 19

求贤兴学诏 / 19

令十科举人诏 / 20

文武职事以才授诏 / 21

刘 炫 / 22

自赞 / 22

陆法言 / 24

切韵序 / 24

王 通 / 26

中说(节选) / 27

论王道与教化 / 27 论教育的作用 / 30 论道德教育 / 30 论知心与成人 / 33 论教育的主要内容 / 34 论教学 / 36 论教师 / 37

隋 书 / 39

儒林传序 / 39

经籍志序 / 41

第二编 唐 代

陆德明 / 49

经典释文序 / 49

条例 / 50

李渊（唐高祖） / 54

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诏 / 54

令诸州贡士敕 / 55

京官及总管刺史举人诏 / 55

置学官备释奠礼诏 / 56

兴学敕 / 57

幼童通经赏以不次诏 / 57

王孝通 / 58

上缉古算经表 / 58

欧阳询 / 60

艺文类聚序 / 60

用笔论 / 61

传授诀 / 62

虞世南 / 63

劝学篇 / 63

书旨述 / 64

笔髓论 / 65

原古 / 65 辨应 / 65 指意 / 66 释真 / 66 释行 / 66 释草 / 67

契妙 / 67

李百药 / 69

赞道赋 / 69

孔颖达 / 73

周易正义序 / 73

尚书正义序 / 75

毛诗正义序 / 76

礼记正义序 / 78

春秋正义序 / 79

对论语问 / 81

高 俭 / 83

文思博要序 / 83

房玄龄 / 86

请尊孔子为先圣议 / 86